

# 物化的社会：阿多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素描

陈燕

(宁波大学法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摘要:** 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 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它却越来越被生产关系所中介; 阶级依旧存在, 但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消失; 真正的个体性正在逐步丧失; 同一性和交换原则一起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 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在不断增强, 但这种极权的政治统治并没有在所有西方国家实现过, 国家资本主义只是表明了西方社会中的某些趋势。理解阿多诺的晚期资本主义观, 也将启发我们如何把握当前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生产力; 生产关系; 阶级意识; 极权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1)03-0055-05

阿多诺坚信, 从各种社会关系来看, 当今的西方社会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就生产力的全部推动力而言, 这些关系本质上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人仍然受经济的支配, 尽管支配者不像以前那样显而易见, 统治阶级匿名化了, 尼采的“没有牧羊人的羊群”的论点已经把握了新的条件。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福利国家的出现,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 原来马克思那个年代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已经逐步消失。资产阶级现代化过程的现阶段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管理。逐步扩大的商品化和物化一起支配了晚期资本主义的运行, 在交换法则的魔力下,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居民越来越按有魔力的极权主义机构的要求来塑造自己。这些居民仅仅是商品化的动因, 所以屈从于物化的交换过程, 好像这种屈从是命中注定的。

##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在马克思那里, 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动态基础,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历史的状况。因此, 相对于不直接创造历史的生产关系而言, 生产力是历史更为基本的决定因素,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而存在。而阿多诺认为, 随着早期自由竞争的资

本主义发展到了晚期资本主义,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中介作用越发加强, 生产力第一的位置被生产关系所取代了。这在他后期的“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一文里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西蒙·贾维斯(Simon Jarvis)对此认为, 阿多诺的立场已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马克思的了。阿多诺仍然坚信, 生产力发展到了如此规模, 以致它好像不是为了物化的社会关系了, 世界也可以从由饥荒所导致的重复出现的大规模死亡的灾难中解放出来: “即便是在最贫困的地方, 也没有人将会死于饥饿。”<sup>[1]59</sup>对阿多诺来说,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没有呈现在一种和谐状态中, 这可以从以下现实中看出来: 当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的时候, 很多商品却被积压着或有意地破坏了。然而这个情形并没有得到解决或关注。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历史的必要首要性的信仰似乎显得太乐观了。按照维尔默尔的分析, 可以从《启蒙辩证法》的逻辑推断出,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的阶段不过是理性和启蒙走向自我毁灭的阶段。<sup>[2]49</sup>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 生产关系没有显示出任何崩溃的信号, 生产关系不仅比马克思那个年代进一步物化了, 而且优先

收稿日期: 2010-10-19

基金项目: 宁波大学学科项目(XKw022)。

作者简介: 陈燕(1981-), 女, 浙江宁波人, 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E-mail: nbnbswallow@hotmail.com

于不断增长着的、为这些关系服务的生产力,而不是相反。<sup>[160]</sup>

其次,阿多诺有一个与马克思的生产力解放不同的侧重点。他比马克思更重视表明这个可能性,即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可能解放我们去进行生产,而且使我们从生产中解放出来。阿多诺对人从生产力中得到解放的兴趣就像他对生产力解放的兴趣那样浓厚。<sup>[160]</sup>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同一的,二者统一于各自共同的核心因素——人。因此,无论是生产力的解放,还是生产关系的调整,都与人的解放息息相关。而只有人的彻底解放,才是生产力解放的最终途径,同时也是生产关系调整的最终目的。在启蒙时代,人们试图通过释放生产力来实现个体和集体的解放和自由。但是,当人们的力量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式发生冲突时,这种个体或人类自由的意识就受到毁灭性的冲击。生产力本身不是可由人类任意支配和使用的中立工具。生产力的发展是双刃剑,它既是人类解放的条件,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条件。在一切为了价值增值和利润的生产阶段,这一实现个体与人类的自由的因素已经成了敌视生活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体的个人已经蒸发了,而思想只有通过否定和批判来实现,对“被伤害的个体”的命运的关注就构成了阿多诺整个理论的出发点。

再次,阿多诺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本身不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种绝对首要性,因为生产力本身总是不断地被这些生产关系所中介或调适着。阿多诺提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今天是一一的,社会因此无需进一步费力地就可以从生产力的角度得到解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它只是“社会必要的幻象的目前形式”。<sup>[160]</sup>这个幻象是社会必然的,因为“早前从彼此,包括活着的人中分离出来的社会进程的瞬间仿佛被控制在最小公分母之下了。物质生产、分配、消费被一起管制着”。<sup>[160]</sup>这个最小公分母是指为了自身目的的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是一种幻象,因为使用价值被错误地认同为是交换价值。

在阿多诺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代表了 this 幻象,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一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处于和谐状态中的,也就是说,为了

自身目的的交换价值的生产是必要的幻象,而既存的生产关系是对它的最好的构架。然而认为这种现象可以通过设置一种自然经济或需要生产的理论而得以纠正则是诱惑人的。<sup>[161]</sup>对阿多诺来说,这可能比想象的更难。因为今天生产力已经反复完全地被生产关系所中介了,因为使用价值已经反复完全地被交换价值所中介了,要进入到对这些过程的了解将取决于那些物化了的的关系的可变性,为了自身目的的交换价值生产的可变性。<sup>[161]</sup>生产关系既然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是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的部分关系,生产关系与人的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也是矛盾性的现实存在,并且通过对生产关系深入的结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本身就是具有许多矛盾的系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变化着的,哪怕在同样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上,也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说法是不完全和片面的。于是阿多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唯一能够进入并了解到生产力的社会学方式将会是通过对这种物化了的关系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只有在这些关系真实的终止处才可能完全成功。<sup>[161]</sup>

随着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力越来越被生产关系所中介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或异化更为扩大,甚至可以说,已经变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隐性运行机制,而这也是马克思在那个年代所无法看到的(或许他有预感),因此阿多诺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优先论,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优先的论断似乎过于乐观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并没有相应地带来或有利于生产关系,或者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矛盾的解决,而他所要做的则是从生产关系,或更为广义的社会关系层面,去分析、揭露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化的实质。

## 二、阶级与阶级意识的新形式

阿多诺在早期“反思阶级理论”一文中描述了那些导致个人消失的经济因素。当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垄断条件的发展时,许多企业主被迫把他们的生意兜售给竞争者。由于他们为了生存,必须交换劳动力而得到工资或薪水,那么

这个经济上被剥夺权利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至少在原则上，是与统治阶级的那些利益或者生产方式的所有者和他们的政治盟友相对的。由此，阿多诺坚持，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必须被保留，因为“社会分化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现象，不仅仅继续存在，且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个观点也必须被淘汰或取缔，因为“正如马克思理论所预见到的那样，今天组成了人类的绝大多数部分的受压迫者已经无法将他们自身体验为一个阶级”。<sup>[3]97</sup>因此，尽管阶级分层依然存在着，阶级的构成已经变化了，归属于一个阶级的主观意识差不多已经消失了。

在1965年的“社会”一文里，阿多诺继续坚持，“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sup>[4]</sup>因为“阶级间的差异随着资本的不断集中而客观地生长着”。<sup>[4]3</sup>年后，在“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一文中，他放弃了以下主张，即大众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工业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暗示了世界“被前所未有的技术增长所完全控制了，以至于曾经特征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和阶级之间随后发生的冲突一道，从活着的劳动力转换到商品——现在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相关性或甚至可以被交付给迷信领域”。<sup>[5]232</sup>虽然工业社会的说法正确地概括了今天的生产力特征，但是生产关系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因为人们仍然是他们当时所是的样子：机器的附属物。在工业工人不得不按照他们所服务的机器来安排他们的生活的意义上：他们被迫没有异议地屈从于——作为角色的承担者——一个抽象的社会机制。<sup>[5]238</sup>当认识到马克思分析的有些方面已经不再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时，阿多诺却仍然就生产方式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控制方面，接受了马克思对阶级成员资格的评价。<sup>[5]233</sup>而且他确认道，阶级关系在北美就表现得很明显。<sup>[5]236</sup>

然而，与马克思相反，阿多诺认为，今天工人们有比他们的锁链更多的东西要失去的了，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他们拥有的早已不仅仅是锁链而已了。马克思所无法预见到的福利国家的建立，部分地就是实现这个改善的原因。与缩短的工作日和改善的工作条件一起，工人享受到了“更好的食物、住

房和穿着；对家庭成员和工人们在他们晚年时的保障；以及平均寿命的增加”。这里阿多诺追随了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他论证道，提供给工人们一个财政上更加稳定且物质上更加舒适的存在福利国家，也促成了阶级的不可见性。除了掩饰既存的生产关系，更高的生活水平也安慰了工人，排除了饥饿会迫使他们“加入到武力中来并发动一次革命”的可能性。<sup>[3]103</sup>借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短语，阿多诺断言，与福利国家一道，统治阶级为了确保他们自身，而有效地加强并保障了“奴隶在奴隶制中的生存”。<sup>[3]105</sup>过去，工人阶级也是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货币或足够的货币，更别提住房条件、基本公共设施、医疗保险等，有的只是资产阶级所给予他们的进行剩余价值再生产的命令或锁链，而现在随着社会体制的改革，如金融体制、医疗体制等，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善，工人阶级也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汽车，享受到了基本的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因此他们的利益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和保障，于是就没有了原先与社会或统治阶级之间的直接对立或对抗的情绪，没有了马克思或卢卡奇意义上的革命意识。

卢卡奇相信，存在着一个超越物化意识的历史主体，它可以重新把握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把握历史的总体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但是，阿多诺从特定时代的历史经验出发，否认这一肯定的总体性乌托邦。现代性的经验恰恰是破碎的经验，“总体是不真的”。<sup>[2]47</sup>否定辩证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否定的总体性来抵抗工具理性的总体性。经历了法西斯的大屠杀后，阿多诺怀疑任何集体解放的乌托邦。任何合作，所有的社会合作和参与的人类价值，都仅仅是对非人道的策略性认可的面具。尽管他仍在探索美好生活的积极形象，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传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已经丧失了信心。

### 三、极权主义的经济与国家干预——兼论与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的比较

波洛克从经济学的维度，提供了一种对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被控制”特征的法兰克福学派式的诊断分析，他的论证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已经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那里竞争让位给了政府干预和公司计划。根据总体被控制的社

会的论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时代——与竞争性的经济关系、民主政治制度和契约上的合法安排一起——掩盖了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统治。但是这些自由的自由主义形式现在只是历史的记忆了。它们逐渐地被一个公开的权力主义体制所取代了。随着现代极权主义政体的出现,受制于直接的控制和命令,个人与社会、私人与公共领域,以及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典型的自由主义二分法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甚至是被清除了。

传统资产阶级企业主,那些控制着他们的企业并以利润为生的人,仅仅被还原为了食利者,并且从一种直接的管理功能中撤离。政府介入到了控制价格和工资、鼓励技术革新、加强完全就业及通过军队和防卫要求的扩张,避免了商品过分积聚集中。这个由国家和大垄断主联合所实施的控制预先阻止了经济周期性衰退中的最糟糕的过剩现象。为了经济上最有利的群体的利益,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政治党派现在可以实施赤裸裸的力量,因为它们由现代管理和官僚制度的所有力量支持着,由大众传媒的微妙而隐蔽的压力所助长着。

阿多诺承认,政治对经济的控制正在增长。“在其可以从作为一个整体的体制的动力中演绎出来的意义上,经济力的控制正在不断地变成政治力量的一种功能。”<sup>[5]</sup>正是作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国家力量获得了它的生长基础(而纳粹德国或多或少变成了潜在于其它西方国家中的趋势的原型)。然而他又解释道,政治对经济的控制本身却是经济条件的副产品。他进一步论证道,假如这个经济上所驱动的政治统治的趋向继续下去,那么“简单地说,目前的社会将直接驶向元经济意义上所定义的形式——也就是说,趋向不再由经典的交换机制所定义的形式”。<sup>[6]</sup><sup>14</sup>但是阿多诺没有认为这个趋势是无法逃避的,尽管这个趋势将实际上得以完成。而只有当它实现了,一种关于完全被控制的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才会得以存在。

阿多诺同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揭示的国家干预对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对黑格尔来说,国家是通过市民社会中的规律和利益的互动而发展的,在那种社会里,个人通过在市场中的交换和其它联合的方式,满足了他们

各自的需要和利益。在他那里,国家最终消除了经济,因为“由于警察的帮助,它从外部”介入到了市民社会中。<sup>[5]</sup>这里的“警察”,对黑格尔而言,包括考虑到减轻贫困、提供健康保险和保持社会的物质结构的公共权威,通过中介私人关系(比如,在家庭中)和国家,帮助国家“实现并维持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中所包含的普遍”。“为了特殊目的和利益的安全和保护,”警察控制“采取了一种外在的体制和机构的形式,就好像这些利益只存在于这个普遍之中”。<sup>[6]</sup><sup>15</sup>与这个“警察”一道,这个国家的普遍利益就得以成功地盛行于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之上,包括经济利益。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国家是一种单纯的“应急国家”或者“知性国家”,也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实体性意义;它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和居于单个的人的特殊利益之上的普遍性。<sup>[7]</sup><sup>328</sup>市民社会本身存在的缺陷和矛盾只有在国家这一最高公共机构中才能消除;而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和权利也只有国家的普遍利益中才得以更好地实现。

尽管阿多诺同意黑格尔关于国家干预对经济的影响的观点,但是他拒绝将黑格尔关于国家干预的阐释应运到大众社会的条件中,就如他拒绝将波洛克的论点应运到这些条件中一样:“假如长时间来是基于干预主义和集中了的计划而讨论晚期资本主义的,且由于它远离了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不再是资本主义了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回应道,个人的命运却仍像是以前那样的不确定。”假如批判尝试着揭示了自由主义市场从未以它的自由主义辩护士所声称的方式那样起作用过,即它从来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阿多诺认为这是反讽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批判已经“复兴在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论点中了”。<sup>[5]</sup>与这个论点相反,阿多诺不仅论证道,经济体制得以存活,部分地是归因于国家干预,而且他声称,如此的干预实际上已经起到了确保经济的继续增长的首要性作用:“外在于这个(社会—经济)体制的东西把自身揭示为这个体制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政治趋势本身。和干预主义一道,体制的抵抗性力量获得了确证”。<sup>[5]</sup>

按照黑格尔的理论逻辑,国家对市场乃至整个市民社会的无限度干预,必将导致一种集权或

极权的政治统治,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就是这一误导的一个极端化:国家绝对至上和国家赤裸裸地全面统治市民社会。而目前为止这种趋势也只有在纳粹德国发生过。因此,阿多诺认为,这个把国家首要性视为部分地由警察和军队所强化的解释只具有一个有限的应运范围,尽管它可能被用来解释其它西方国家的极权主义趋势;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性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

通过一系列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章,如“社会”“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反思阶级理论”等,阿多诺认为,大众社会的权力是由经济和政治组织捍卫的,但他并没有认为经济组织已经从属于政治组织,而是政治系统还跟随着经济发展,包括生产关系的变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生产关系却对生产力具有压倒性优势。阿多诺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们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相冲突的论断过于简单化了。阿多诺承认生产力与科技的发展是人类解放的条件和基础,有了它们,人类未必解放,但没有它们,人类一定不解放。然而,阿多诺想强调的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有其两面性,它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尖锐化,另一方面,它又内在包含着对自然的暴力统治,而对自然的控制必然导致社会对人的控制。所谓世界史,就是一个从控制自然走向控制人类的统一性

过程:“世界史根本没有从野蛮走向人道主义,而只是从弹弓走向了百万吨级的核弹”。<sup>[8]320</sup>在他看来,这种总体化的控制是批判所面对的最大敌人,它渗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幸免。所以,阿多诺着手用对控制的批判来扭转马克思确立的经济批判和政治阶级路线,这一转向是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所共同主张的。理解阿多诺的晚期资本主义观,也将启发我们如何把握当前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 参考文献

- [1] JARVIS S. Adorno: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2] 俞吾金. 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3] ADORNO T W. Reflection on Class Theory[M]// ADORNO T W. 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 A Philosophical Read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4] ADORNO T W. Society [J]. JAMESON F, trans. Salmagundi 3, 1969-1970, 10-11: 149-150.
- [5] ADORNO T W. Late Capitalism or Industrial Society?[C]// MEJA V, MISGELD D, STEHR N. Modern German Soc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 COOK D. Adorno, Habermas, and the Search for A Rational Society[M]. London: Routledge, 2004: 232-245.
- [7] 洛维特. 从黑格尔到尼采[M]. 李秋零,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8] ADORNO T W. Negative Dialectics [M]. ASHTON E B,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3.

## A Materialized Society: Adorno's Sketches of Late Capitalism

CHEN Yan

(Faculty of Law,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productivity enjoys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late capitalism, it was increasingly mediated by production relations. Classes still exist, but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s has disappeared and the real individuality is disappearing. Identity and exchange principle jointly have reinforced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the control of politics on economy has been constantly enhanced. But not all western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the totalitarian domination. The state capitalism just suggests some trend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Understanding Adorno's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outlook will enlighten us on how China will go along with modernization.

**Keywords:**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totalitarian; state capitalism

(责任编辑 张文鸯)